

战胜之后，乃误以为初与姬姓战于北方者即为后来之三苗，所用者亦即后来九黎之民，遂有今日之苗族，先汉族入中国，后乃为汉族所逐之说矣，共工三苗皆当时姜姓之仇舜者，实仍姬姜之争耳”。（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这些宝贵的见解，实足够祛除民族间无谓的隔膜，可惜近来研究历史的人，或是懒惰因袭旧史或是好博采群说，自炫渊博，还不能正确的采用这些见解，遗误民族团结，影响是很大的，这个错误应该即时矫正，如果仍然持续历史上的错误，不但见智识的浅陋，与事实脱了节，也辜负了研究历史的意义，继承这错误的传统，等于替帝国主义修改歪曲我们民族史，扰乱自己统一抗战的亲密性，便利他们侵略，无异作文化的汉奸，我们应该立时退出狭隘的以讹传讹从前错误的民族观念樊笼，发扬这光辉灿烂五千亲爱团结的自然混合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华民族！扬弃历史荒诞故事的传说否定帝国主义拐骗诱惑的谰诬阴谋，由新的质变，才能够达到正确的全民结合，以答复日寇无赖的挑拨，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向我们抗战建国神圣民族解放斗争光明前途迈进！把帝国主义用民族自决欺骗我们阴谋的工具转变成揭穿这种阴谋，防止这阴谋，突击这阴谋的工具开展为宣传团结，领导团结的教育工具。

【论 文】

续论“中华民国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

《益世报》1939年5月8日《边疆周刊》第2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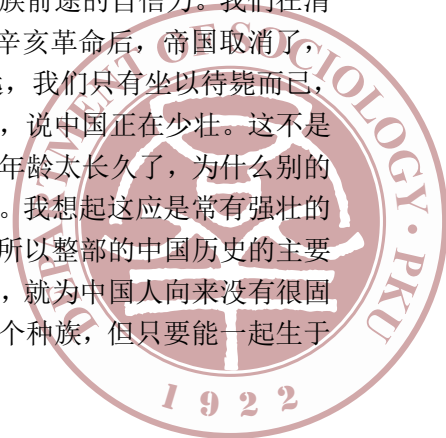
顾颉刚

孝通学兄：

接到你四月九日来书，和我讨论民族问题，很使我兴奋。我怀着这些意思好多年了，虽是解决这问题，自知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但只要能作一个提出这问题的人已使我心满意足。承你肯来和我讨论，借此激起别人的注意。共同来解决这个大问题，使得中华民族有极坚固的团结，那真是国家的如天之福，岂但为提出问题的人的荣幸！

我个人耕作的园地，你必然很清楚，是在高文典册之中，为什么这一次要轶出原定的范围，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的区域而提出这个问题？难道是我们的忽发奇想？不是的，这完全是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现在就先耗费些时间，把这段经过情形详细写告。

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商务印书馆嘱我编辑一部初中本国史教科书。那时我不愿意随便抄书完事，很想在这部书里给予中学生一些暗示，使他们增进对于自己民族前途的自信力。我们在清朝时，常听见人家称中国为“老大帝国”，表示其奄奄待尽的状态。辛亥革命后，帝国取消了，但老大还是老大。如果中国真老大了，那么由衰病到死亡为期已不远，我们只有坐以待毙而已，还有什么希望，还能鼓起什么工作的勇气！因此，我想给暗示青年们，说中国正在少壮。这不是我杜造事实。实在历史里的证据也不容我不这样说。中国民族的生存年龄太长久了，为什么别的古老的民族早已亡却，而中国还能支持下去，这一定有一个理由在内。我想起这应是常有强壮的异族的血液渗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而追求内外各族所以能融合无间的原因，就为中国人向来没有很固执的种族观念。明明是不同两个种族，明明是很有历史的仇恨的两个种族，但只要能一起生于



一个政府之下，彼此就都是一家人，大家可以通婚，大家可以采取了对方的长处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形式，因此中国民族就永远在同化过程之中，也永远在扩大范围之中，也就永远在长生不老之中。譬如商和周，一个起于东方，一个起于西方，决不是一个种族。商人在中原生息了一千多年，文化高了，大家喜欢享乐，俾书作夜的喝酒，眼看他们是衰老了。周人挟其新兴的锐势，把商朝打灭，论理周人出于西羌，尽有把中原文化大摧残的可能，然而他们却安然承受了商的文化，更把它发挥光大，舍短取长，这衰老的文化就得了新的生命了。姬姜诸姓本非诸夏，但入据中原之后马上成了诸夏，和向来住在中原的人民互通婚姻，这衰老的种族又得了新生命了。周人封诸侯于四方，把诸夏的文化、语言和血统扩张到非诸夏的区域里去，七八百年之中把东夷，北戎，西戎，赤狄，白狄，群蛮，百濮，融化得干干净净，到秦始皇时就不费大力气把全国统一了。秦朝虽倒而诸夏和夷狄所混合的民族则不倒，也绝不听见他们里边闹过什么种族问题，可见秦皇所混合的只是几个国家，所打倒的只是这几个国家里的特殊阶级，至于这国内的人民是早就同化为一个民族，早就自己统一起来了。秦汉以后，又有匈奴，鲜卑，西羌诸族的问题，似乎要把汉人压倒，到了五胡乱华，中国土地失掉大半，用了偏狭的种族观念看来当然是中国的大不幸，但从远处着想，则渐渐衰老的中国民族又得了救星。因为这班入据中原的雄主只是想抢地盘，并不是坚持了他们的种族观念而要把汉人消灭，况且他们寄居内地，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已深，所以跟汉人杂居也不会发生什么种族问题。不但不发生种族问题，而且他们还要竭力地消灭种族问题。例如刘渊建国，不是称为匈奴而称曰汉，表明他的国家是继承刘邦的朝代的；李雄建国成都，不自称为氏而称曰成，其后李寿继位，又改国号曰汉，表明他的国家即是刘备的汉蜀的后身。华化最著名的要算北魏的孝文帝了，他的一切政治设施都要上规三代，先废掉自己的姓拓跋，改姓为元，又命其国的鲜卑族都把复姓改为汉式的单姓，又令鲜卑人和汉人通婚，甚至强迫年轻的朝官“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改说中原的语言，这里是有意识的把鲜卑人和汉人混合了。汉人受了五胡的压迫，许多有地位的人逃到南方，从长江以南直到南海就完全开发了，许多南方部族也就并入汉人里去了。因为有这样的大混合，所以会有隋唐的统一，在种族上，在文化上，都大大地表现这返老还童的新气象。嗣后，唐代有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诸族问题，宋代又有契丹，女真，西夏，蒙古诸族问题。但结果还是同以前一样，有的全部并入汉人里去了，有的也有一部分并入汉人里去了。近数百年中，闽粤人到南洋经商的极多，当有娶了当地女子成家的，所以马来种也混入汉人的血统。中国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现在可以溯至三千多年以上，将来考古学发达之后或可上推到万年以上，我们的民族所以能这样的永存，就因为我们大度包容，我们肯吸收新的血液，我们不存什么狭隘的成见，所以有极强的向心力，进来一批就同化一批，质的方面愈糅杂，量的方面愈扩大，纠纷是一时的，表面的，而统一则是经常的，永久的。（上述意见会写入《古史辨》的第一册自序，页 80-90，今加以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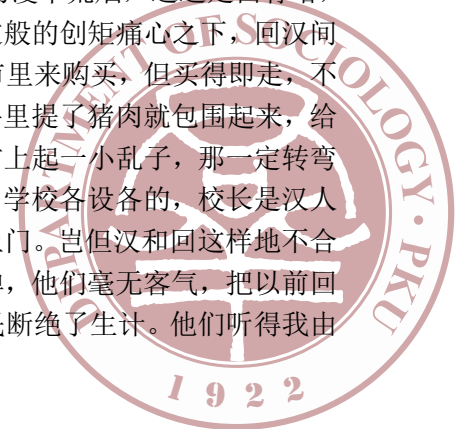
这是我对于这问题的第一次注意。可惜商务印书馆急于出版，这部教科书竟不能称心编好。民国十三年，西藏班禅喇嘛为和达赖不睦，避居北京，这件事从我们看来似乎很平常，但一班蒙古人听得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了。平绥路车一批批载着蒙人前来朝拜，街上连接不断地跟着穿了黄衣和红衣，着了皂靴，手捧了香盒的男男女女，这又给我一个新奇的刺激。我们生长在沿海的人看外国人很容易，而看本国的边地人民却很难，因为容易看见的边民都改装了，分辨不出来了。我平时在北京所见，代表蒙藏人的只有几个喇嘛，到这时才真正见到成群的蒙古人民。我觉得蒙古人有这样虔诚的信仰，不辞跋涉，不惜耗费，携妻挈子而来，只为向班禅磕一个头，这种宗教热情便是汉人最缺乏的，应当吸收的。又想他们生长在大自然里，身体健壮，他们的先人已有一部分和我们同化了，我相信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继续了这先辈的足迹而加入我们的队伍里。因为有了这一点感触，我就写了一篇“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投登在徐旭生先生主编的《猛进周刊》。这是我对于这问题的第二次注意。

我当初使用这“民族”一名正同你的意思一样，凡是文化，语言，体质有一点不同的就称之

为一个民族。请你翻出我的《古史辨》看，“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写得真太多了。向来汉人自己都说是黄帝子孙，我研究古史的结果，确知黄帝传说是后起的，把许多国君的祖先拉到黄帝的系统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于是我断然地说，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个民族。但是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从前我对于自己的期望只是毕生研究与世无关的学问，绝不愿学以致用，免得和政治发生联系，生出许多麻烦，到这时碰到空前的困难，才觉得我们的态度有改变的必要，我们的工作再不可对于现时代不负责任了。于是逢着和师友们谈话，常常把“民族”名义请教他们，结果使我知道民族就是一个有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安乐，同患难的便是，文化，语言，体质方面倘能混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便不能，亦无碍其为一个民族（理由下详）。想起汉人的来源，拿来比拟，就觉得再切合不过。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体质的糅杂，他们为了具有团结的情绪和共同意识，就成了拆不开的团体了。再想蒙、藏、缠回，知道他们都是部族。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现在的蒙、藏、缠回则是同化未尽的，然而即此同化未尽的也是日在同化的过程之中，将来交通方便，往来频繁以后，必有完全同化的一天。至于现在虽没有完全同化，然而一民族中可以包含许多部族，我们当然同列于中华民族而无疑。这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三度注意。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察哈尔的德王也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宣言内蒙自治，我们住在北平，见闻较切，又来一个强烈的刺戟。翌年夏间，我就和吴文藻先生等同至百灵庙，和德王及其部属作了几天周旋，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算抓住了。原来蒙人不受教育，又甚散漫，那里想得到自治自决问题，这不过是几个上层分子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要使自己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做出一番投机事业而已。他们会公开地向我们讲，“自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答应每月给发经费三万元，但日本人来拉了，说你们若到我们这边来，每月稳给三十万元。我们究竟走那条路，是应当考虑的”。那时我们就料到，他们如果惟利是图，那么以“民族自决”开始者必将以“出卖民族”终结，果然两年之后德王就投到日本人的怀抱里去了。犹记我们访问德王，听他的话是北平话，看他所读的书全是汉文书籍，问一问他所受的教育，知道他从小在归化城里读汉文，我们吃饭时随便讲笑话，他也能从人名作对子，受汉文化陶冶之深真与汉人无二。可是他正式向我们宣讲时便只说蒙古话，而担任翻译的那位职员虽然生长在北平，说得一口极流利的京话，并且能唱京剧，也惺惺地作态道，“兄弟是蒙古人，汉话说不好，请诸位原谅！”我当时禁不住对他们起了反感。我想，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北平话原是我们的“国语”，而且你们说来比我们南方人还强得多，为什么要摆出这样的虚架子来？这当然是他们胸中横梗着“民族”的成见，以为“你们是汉民族，我们是蒙民族，我们应说自己言语来表示我们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形之下，使我更觉得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就亟纠正的必要，否则，各部分分崩离析起来，我们还说什么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这是我第四度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

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到西北游历。十年前，国民军驻防在西北，曾因主客的互不了解，激起了回汉间的大冲突。那时我只在报上看见，印象不深，以为事平后就回复原状了。万想不到这次车轮马迹所至，进一座城就见全城的颓垣断井，歇一个村就见满村的漫草荒烟，这边是白骨塔，那里是万人冢，一处处的伤心裂胆，简直不忍张开眼睛来直面。在这般的创痛痛心之下，回汉间有了鸿沟了。住在洮河西边的回民，日用的东西不能不到东岸的城市里来购买，但买得即走，不吃一餐饭，不睡一夜觉。某一个城，权力属于回民，他们看见汉人手里提了猪肉就包围起来，给他一顿毒打；几个汉人聚在一处谈话，就犯了阴谋的嫌疑。只要地方上起一小乱子，那一定转弯抹角讲作了回汉问题，大打电报，广发传单，造成一个恐怖的局面，学校各设各的，校长是汉人当然招不到一个回民学生，回民当了校长，汉人子弟也不会有一个上门。岂但汉和回这样地不合作，这端又把番民掀入漩涡里。可是番民不同汉人，家里都藏着枪弹，他们毫无客气，把以前回民所买所租的田地统统用了武力收回了，逼得一班庄稼汉为生的回民断绝了生计。他们听得我由



中央前来，便不管我们是做什么的，七手八脚拉住了我们的马头，跪地号啕大哭起来，称我们为“中央救苦大员”，要求替他们伸冤，好使我们上庄。在这等异常明显的畛域之下，十年前的好朋友也为当地的成见所劫持而不敢当面讲话了，有两位先生先后向我们说：“我们在外边是一家人，到了本乡就分作两家人了！”亦惟在这等异常明显的畛域之下，帝国主义者的分化工作也就容易入手多多，他们只怕天下无事，正在待时而动。许多人不到西北，报纸上看不见多少西北的新闻，总是以为那边是很平静的，那知亲临其间，竟是惶然不可终日，各个帝国主义者已把战场布置好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本来没有这个名词时，每次内乱只是局部的事件，这件事一解决就终止了。现在大家嘴里用惯了这个名词，每逢起了什么争执和变动，大家就不先去批评那一方面的是非曲直，只说是某民族与某民族之争，于是身列于某民族的，即使明知自己方面起哄的人是怎样轻举妄动，也必为民族主义努力，替他回护或报仇，而私人的事就变成了公众的事，随时把星星之火扩而充之，至于天崩地裂的可能。事件平了，两族的冤仇就永远记住了，报复的机会是总有一天会来到的。假使各方面确是单纯的种族，互不相通，为了爱护本族不恤和邻族拼个你死我活，那还值得。无如血统之间早已混合，番和汉，番和回，回和汉，通婚的不计其数；回女虽说不嫁汉男而汉男却尽可娶回女，他们想不到生下的孩子也传得一半的母系血统，何况陕青宁的回民除了极少数的祖先是阿拉伯等处来传教者之外，其余本来是汉人呢！（即此极少数，也以历代混合的结果，在种族上已经全是汉人，除汉语以外再不能说其他的话语了。）我向一位最固执的教主询问道：“阁下祖籍是土耳其吗？”他却很自然地答道：“舍间也是从南京迁来的”。教主况且如此，何况教民。可知他们种族方面原无问题，不过被这个新传入的带有巫术性的“民族”二字所诱惑，大家为他白拼命而已，唉，多么的可怜！这是我第五度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且是印象最深切的一次。

自从得这一回经验之后，我就不敢因为自己学识的浅薄而放弃了救援边疆同胞的责任。我想帝国主义者为要达到他们瓜分我们土地大欲，造出这种分化我们的荒谬理论来，我们的知识分子被他们迷蒙了心，又替他们散布这种荒谬的种子到各处去，若不急急创立一种理论把这谬说挡住，竟让它渐渐深入民间，那么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便不是我们的了，数千年来受了多少痛苦搏合成功的便一旦毁灭了！旅行中颇有闲暇，就在车箱之中，马背之上，结构成了一套理论，到云南后，趁着朋友逼我写文，就写出“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二文。来书说我“立论的目的似在写‘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我们政治的统一’一句话找一个理论的根据”，真是道出了我的心事，搔出了我的痒处。不过我的意思不只限于“政治的统一”，还要进一步而希望达到“心理的统一”耳。

以上是我所立论的原因。我虽是没有研究过社会人类学，不能根据了专门的学理来建立我的理论，可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你明白了这一点，或可对于我以前所说的越俎代庖的话加些原恕，所以我把这近十余年来的经验一一奉告了。下面再来书所说加以答辩：

来书的第一节为“名词的意义和作用”，开头说：“先生在上述二文中，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语文中的名词与其所标象的客观事实不可不符”，这句话实在是误会了我的意思。“中国本部”一名所以不可不废除，正因客观事实没有和它相符的，“五大民族”一名也和客观事实差池太多，我们为要使名词适合这客观事实，不致陷于“用名以乱实”，渐至“用名以乱国”的地步，所以不得不起来加以严厉的纠正。你说马凌诺斯基“把名词的用法分成两种：一种是科学的用法，名词所指是根据经验的，可以捉摸的，有客观实体相符合的；一种是兴比的用法，把一个名词用来引起对方的反应”。照你下文看，似乎你以为“中国本部”和“五大民族”都是科学用法的名词，那末我敢再申前论。

外人称我们的满洲为 Manchuria，称满人为 Manchus，称蒙古为 Mongolia，称蒙人为



Mongolian, 称新疆为 East Turkistan, 称回民为 Mohammadans, 而称们的十八省为 China Proper, 称汉人 Chinese, 简直把我国裂成五国, 而屏满蒙回藏于中国之外! 我们以前的名称是西域, 现在的名称是新疆省, 他们都不用, 偏称为“东土耳其斯坦”, 很清楚地要使它联接西边的土耳其而疏远东边的本国政府。中国的地方制度, 从前有郡县与藩属之别, 现在有各省与自治地方之别。若是以郡县区域为本部, 则东三省和新疆省在清代已设府县, 何以偏不列入本部之内, 使和客观事实相符? 若说此数省僻在边陲, 则福建, 广东, 广西, 云南俱与他邦土地毗连, 何以那几省却又列在本部? 若说此数省的居民种族和内地有异, 则东三省除极少数之“鱼皮鞑子”及比较不多之人以外, 内蒙各地汉人的数目也超过蒙人多多, 而西南诸省各小部族还没有完全同化, 即浙江亦尚有畲民, 事正一律, 何以有本部与非本部的区别? 若说此数省隶属较迟须过多少年才可进于本部, 无论在政治上无此辨别, 就拿历史来说, 周初已通肃慎, 战国时已设立辽东和辽西郡, 远在开发江南之前, 西域与西南夷的建置官属亦同汉武帝之世, 哪里有什么迟早之别? 所以“本部”一名, 无论用了哪种方法来讲都是讲不通的。我敢断说, 这个名词是外国人凭空造出的! 是不可捉摸的, 是没有客观实体相符合的! 这个名词, 我想, 倒可以归入兴比的用法之内, 因为一说到“本部”, 就使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是中国的领土了, 于是中国人不妨放弃, 帝国主义者自然可以放手侵略了。这不是利用了刺激听者的感情反应的方法而攫取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吗?

像这等造出了名词来分化我们的例子还有许多, 就现在想到的说一下。当日本和帝俄为了抢夺满洲而战争之后, 两国就协调了来分赃, 从此便有了“南满”和“北满”的名词; 他们私下讲好, 南满是日本的, 而北满是俄国的。因为这些名词仅为便利于侵略, 临时想出的, 所以没有和它相符的客观事实。听说九一八后, 日军北向侵黑龙江省, 他们驻滨江的总领事远不知道南北满以何处为界, 大为惶惑。这是一件事。英人的势力达到西藏之后, 俨然把西藏看作自己的保护国, 民国初年他们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干涉西藏内政, 并提出“内藏”和“外藏”的名词, 以打箭炉以西直到阿里统为“外藏”, 并主张完全自治, 只留青海南面一小部分“内藏”给中国政府统治, 如果那时我们的政府屈服了, 那么西藏和西康已久不是我们的领土了。试看清朝末年英藏直接交涉的公文, 他们对于西藏直称以“国”, 于达赖喇嘛呈国书, 一则此“全藏国家”。再则曰“西藏国家”, 三则曰“英国与藏国”, 可见他们早不把西藏算作中国的一部分了。(见北平研究院编辑之“清代西藏史料业刊”, 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们想实际上上拿去整个西藏(外藏)而名义上却还留下半个西藏, 这是怎样的不顾客观事实? 这是又一件事。

写到这里, 想起了两个最有趣的名词。伪满洲国为什么叫“满洲国”, 岂不是因为这是清朝初叶的根据地, 而清皇室是自称为满洲人的, 我们姑且不论清朝的根据地在那里, 和那些地原是他们从明朝手里夺过去的, 就说东三省是满人所固有, 那么这个“满洲国”也只限于东三省而已。然而, 试看, 自从民国二十二年长城战役之后, 日本人把热河省抢过去归到满洲国的版图之内了! 热河省原是蒙古的昭乌达和卓索图两盟地方, 清代也已设置府县, 和满洲有什么必须并家的理由? 日人一方面假借满洲名义成立了“满洲国”, 一方面又想假借蒙古名义酝酿“蒙古国”, 那么他们应当以满归满, 以蒙归蒙才对, 什么要夺蒙归满, 自己扯破了这一张“民族自决”的幌子?

(实在说来, 蒙古的哲里木盟跨有辽吉黑三省之地, 如果蒙古人真正民族自决起来, 还应首先问伪满洲国收回这些地方呢。)即此可见他们的口不应心和掩耳盗铃的丑态! 还有一个名词是“华北”, 这个名词跟着“中国本部”而来。人家替我们划出一块地方叫做本部之后还嫌不够分化, 又在这名词所标象主观区域之内划为“华北, 华中, 华南, 华西”几部分, 大约华北指的黄河流域, 华中指的长江流域, 华南指的珠江流域, 华西指的江河上游。如果照这样来讲, 那么,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陕西五省都应归入“华北五省”才是。可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首领陆军中将土肥原口中的“华北五省”, 却是河北, 山东, 山西, 察哈尔, 绥远! 这岂不轶出了他们所谓本部的区域? 难道他们大量, 有意把本部地方放宽了吗? 不, 这是因为这五省接近满洲东蒙, 日本人

在那边下了功夫多了，觉得支配得动了，所以要促使这五省快些步东北四省的后尘，而另组成一个伪国，所以他们先强迫我国政府设置一个“华北政务委员会”，为脱离中央的准备，还尽催“华北五省的‘特殊化’和‘明朗化’”。唉，特殊化，明朗化，这是许多新名词出现的原因！你所说的“‘这类名词’目的并不在说明事实而另具其他作用”，这是最不错的。惟其如此。所以这类名词，所标象的只是主观的作用而不是客观的事实。

以上说的是地理方面的几个新名词，现在再说种族方面。帝国主义者不但分割我们的土地，而且要侵害我们的人民。最显著的，像“独立罗罗”（Independent Lolos）就是一个。夫罗罗人栖息之地即在人们所谓中国本部之内，罗罗人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可以和中央政府对立的，只不过一部分住在深山之中，与外界接触太少，自成风气而已，何得谓为独立？陶渊明作的桃花源记，秦人有避乱入武陵山中者，其子孙“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难道我们可以说桃花源中人也是魏晋时代的独立民族？

“五大民族”一名似是而非，并没有客观相符的实体。满人本不是一个民族，在今日除了“鱼皮鞑子”（赫哲、达虎尔等）之外固已全体融合在汉人里了，即在当年亦不具一个民族的条件。明朝建州左卫的女真世袭指挥，受了甚深的汉化，要自建一个部落，就他力之所及，把女真，高丽，蒙古和汉人合了起来，成为一个新族，所以虽在真正的满洲八旗中，汉人和高丽人的血统已掺入不少。如所谓瓜尔吉，即关家也，董鄂，即董家也（此类事实，《八旗志氏族志》中记载甚多，《礼亲王肃亭杂录》亦有，将来当笺出）。他们初起之时已就如此，何况后来完全汉化的时候。我记得幼年时，常听家乡传说，谓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送他到宫里去玩玩，那知抱出来时，就换了一个女孩子了。初以为这是里巷不经之谈，后来看见曾任女官的德龄做的“清宫二年记”也有同样的记载，始知这故事不是我们江苏人杜造的。无论此说为真为假，康熙，嘉庆，道光三个皇帝的母亲纯是汉人却是无可疑的事实。（康熙母亲佟氏，辽阳汉姓钜族，世人皆知，此二者见张尔田《清后妃传》稿）。就说这是他们一家的事情，关系细小，我们不必管。再就体质讲，汉和满实在也分不开来。五六年前。丁文江先生到燕京大学来测量江苏安徽两省人的体格，测到我时，他惊讶道，“你真是（Typical）江苏人！”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你的后脑扁平，这是沿海一带人的特质，连东北也是如此”。我想，我们的祖上，汉武帝以前住在浙江海边，汉武帝以后直至现在二千余年住在江苏海边，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碰到几个满人，我注意他的后脑，果然也是扁平。因此，疑心有史以前居于渤海，黄海和东海岩岸的是一种人，后来隔绝了，才有朝鲜、肃慎、东夷、吴人、越人诸种分别。近来我留心古代沿海一带的人名和地名，觉得也可以证成这个假设。所以就使说民族之中应有体质的成分，汉和满是否定该分为两族也是大有疑问的。

我敢率直奉劝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人，你们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不应当听了别人说中国境内有五大民族，就随声附和，以为中国境内确是五个民族，使得一班人跟着你们，更增高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宣传的自信心，陷国家于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我们常常用了“苗民族”、“瑶民族”、“罗罗民族”、“僂夷民族”等名词来说话作文，岂不使帝国主义者拍掌大笑，以为帮助了他们的分化功劳？这是我的一点愚诚，希望你采纳的。

本刊篇幅太少，写到这里已经完了，余下的话，只得留在下期里再谈，乞原谅。

